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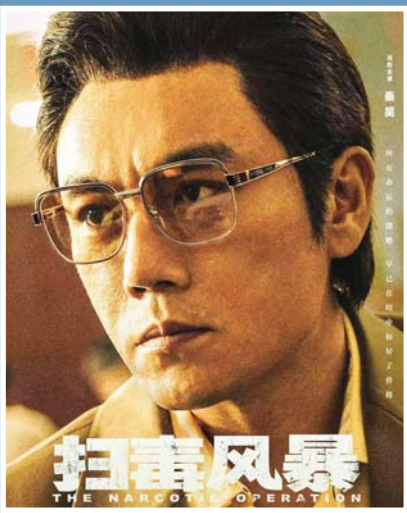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莹

热播剧集《扫毒风暴》以高口碑收官，饰演毒贩卢少骅的秦昊收获了“反派演技天花板”的高度认可。

秦昊这个演员是个谜，他的形象气质很文艺，但近些年演的角色都不文艺。看《扫毒风暴》，你明明知道卢少骅是秦昊演的，但你丝毫不会跳戏，他的眼神、动作、细节，都让观众觉得他就是卢少骅本人。

《扫毒风暴》剧集的结尾，卢少骅被警方抓住，可以说，秦昊在这一段表演中，对一个亡命之徒进行了不流于表象的演绎，在押送他的车上，他面对警察仍然态度嚣张，“你们想要以智慧战胜我是不可能的”，警察拿出他的“毒品”，问“这是什么”，他答“这是你的一等功”。他用沙哑的嗓音压抑着不甘和恐惧，“希望你不要连累任何人，问题是我的就是我的”，面对一车的武警，卢少骅还能提出自己的“希望”，这一剧情由秦昊笑着说出来，将一个重大毒贩的阴险和狡诈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可以说，秦昊在《扫毒风暴》中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他没把卢少骅当“角色”来演，而是当成了一个“有习惯、有弱点、有算计”的活人——有着活人的质感。敲桌面的节奏永远是“两轻一重”，暗示“按我的节奏来”；在制毒工厂的戏里，他穿着沾满化学试剂的工装，却会下意识把袖口卷到离手肘两指的位置；发现配方出错时，他没有骂人，只是突然把卷起的袖子放下，这个“收”的动作，比任何咆哮都有压迫感；卢少骅的声音好像是温和的，但秦昊让这份温和成了最毒辣的手段。对



多面秦昊



家人说话时，他的尾音会带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，像是刻意放软了声；而对核心手下下达指令时，他的语调反而平稳得像在说天气，甚至会在句末加个轻笑。

最近几年，秦昊出演了很多刑侦题材剧集，这个类型题材剧集里的正反两方面角色他都演过，程兵的硬，严良的锐，张东升的阴，卢少骅的狠，从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漫长的季节》到《三大队》《扫毒行动》，每一个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这些年他参演过的悬疑剧，豆瓣评分平均高达8.5分。

去年播出的《三大队》中，秦昊扮演三大队队长程兵。这部剧和《扫毒行动》拍摄时间接近，但秦昊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。《三大队》里的秦昊是妥妥的硬汉，他饰演的程兵蒙冤入狱，似乎狱中的光景磨没了他的锐气，当局长对他说你是一个好警察时，此刻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瞬间爆哭，情绪表达之炸裂，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角色的硬汉底色。程兵在查案时有紧张、辛酸，也有搞笑，秦昊的表演饱满立体，给整部剧加分不少。

秦昊表演最大的优点是松弛、自然。看他演的剧完全被他带入，往那儿一站就自带人物感，松弛得像在生活里原本就有的立体人物。他塑造的角色，不是单纯的人性的恶，而是能让观众咂摸到人物的命运走向，将角色的灵魂刻在荧屏前，让整个故事在观众心里完成，把每个角色演成“限定版”，这功力确实是很牛了！

在我看来，作为演员的秦昊，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他不太受行业的浮躁干扰，从他对剧本的选择不难看出，他的精品很多，即使每一部作品爆红，他也没让自己参与的活动泛滥，他的妻子伊能静邀请他在直播间聊聊作品，他却说：“该给观众的我都已经留在角色里了，不用再多说了。”这是他创作的初心本心，也是优秀演员的自我修养。

我更期待的是，秦昊下一个要颠覆的，是什么角色？



照相馆里的历史真相



□胡婷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真实罪证影像，巧妙地围绕“照相馆”和“照片”展开叙事。

照片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媒介，电影借助“拍照片”“洗照片”和“传送照片”的线索，引出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，电影嵌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照片，很多场景也以历史照片为蓝本进行高度还原。刘昊然饰演的苏柳昌等人面对霸道横行的日军，他们没有反抗的武器，却以照相机为武器，通过揭露日军在南京城的种种罪行，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
电影将镜头聚焦于平民群像，透过他们展现出战争熔炉中人性复杂而真实的全貌。王骁饰演的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，是这种人性挣扎的典型代表。面对仅有的两张通行证，苏柳昌与林毓秀主动让出，展现出无私的一面，老金的妻子眼中满是对生存机会的强烈渴望，老金则在愧疚与责任的重压下犹豫不决，最终他们采取抓阄的方式做出选择。这一系列情节，精准地捕捉到了普通人在绝境中对“活着”这一本能的渴望，但正是

在这层怯懦的底色之上，他们坚守“不做汉奸”的底线，在乱世中相互扶持、彼此帮助，这份微弱却珍贵的良善之光，更凸显出他们内心挣扎的分量与价值。

王传君饰演的翻译王广海，是影片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，他在日军面前极尽谄媚，协助日军拍摄虚假宣传照片，甚至在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现场，冷漠地充当看客。一直以来，他将“活着”视为人生唯一的信条，但在他无情的表象之下，依然隐藏着未泯的人性。他暗中帮助苏柳昌隐瞒身份，看到自己的爱人被侮辱时，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瞬间爆发。这种“背叛”与“良知”在他内心激烈地交锋碰撞，揭露出了战争对人的无情异化。在邮差、照相馆老板、伶人、被迫参战的警察等小人物身上，人们看到了怯懦与勇敢、自私与牺牲、苟活与尊严这些矛盾特质的结合体，影片没有将他们简化为一个符号，而是完成了多层次的表达。

在对日军暴行的整体性呈现之外，电影对伊藤秀夫这个日本军官的刻画也较为立体。伊藤深谙中国文化，他会拍摄南京的风景寄给父亲作为礼物，会用白米去喂流浪

狗，也会拿起林毓秀的胶卷说等战争结束，自己也要去拍电影。但在对伊藤的刻画中，影片仍然揭示了伊藤表象下的本质，他假意颁发通行证却下令杀人灭口，伪善的面孔下藏着一个恶魔。

电影尾声，伊藤撕开被调换的胶卷盒，里面是贡院街居民绵延数十载的生活底片，有婚丧嫁娶，也有学业和工作纪念，这些平凡瞬间交织着南京城的烟火气息与岁月年轮，胶片凝固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尊严，也是中华民族未被摧毁的生命韧性，引发很多人共情。

行刑场上，枪口对准战犯，围观人群中悄然浮现已牺牲的苏柳昌、老金、宋存义等人的面庞，这种表现手法呼应了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关于生命延续的一段思考，“有一天，在某一处山洼里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，抱着他的玩具。当然，那不是我。但是，那不是我吗？”已经牺牲者的“在场”，构建了一个跨越生死的记忆共同体。历史的重量，除了对暴行的控诉，也在于对牺牲者所代表的生活可能性的永恒缅怀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